

北

大

记

忆

我们对于北大的「感情」

是理不清 一 说不尽的

就像是对待自己的 一 父亲和母亲

家住 未名湖

么书仪 洪子诚 著



北京大学出版社
PEKING UNIVERSITY PRESS



家住未名湖

么书仪 洪子诚 著

一
北
大
记
忆
一



北京大学出版社
PEKING UNIVERSITY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家住未名湖 / 么书仪, 洪子诚著. —北京: 北京大学出版社, 2018.5
(北大记忆)

ISBN 978-7-301-29416-1

I. ①家… II. ①么… ②洪… III. ①散文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8) 第 056650 号

- | | |
|-------|--|
| 书 名 | 家住未名湖
JIA ZHU WEIMINGHU |
| 著作责任者 | 么书仪 洪子诚 著 |
| 责任编辑 | 黄敏劼 |
| 标准书号 | ISBN 978-7-301-29416-1 |
| 出版发行 | 北京大学出版社 |
| 地 址 |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|
| 网 址 | http://www.pup.cn 新浪微博: @北京大学出版社 @培文图书 |
| 电子信箱 | pkupw@qq.com |
| 电 话 |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0883 |
| 印 刷 者 | 天津光之彩印刷有限公司 |
| 经 销 者 | 新华书店 |
| | 660 毫米 × 960 毫米 16 开本 19 印张 243 千字 |
| | 2018 年 5 月第 1 版 2018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|
| 定 价 | 49.00 元 |

未经许可,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。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举报电话: 010-62752024 电子信箱: fd@pup.pku.edu.cn

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出版部联系, 电话: 010-62756370

序

这本《家住未名湖》的前身是《两意集》和《两忆集》。

1999年《两意集》由学苑出版社出版，内容是由“东京记忆”和“当代文学研究”两部分组成，由于两部分命意不同，寓意有别，所以书名定为《两意集》。

2009年《两忆集》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，《序言》中写道：

本书的前一半应该叫作“北大记忆”，因为自1956年和1963年开始，我们就进入了北大：在北大求学、毕业、教书、生活……做学生的时候勤奋努力，教书的时候也算兢兢业业，政治运动中“革命”和“被革命”，改革大潮中或随波逐流或“与时俱进”，在自己的研究中“衔泥垒窝”……

时至今日回首前尘，一万八千多个工作或者生活在北大的日子，几乎是我们生命的全部。其中经历的顺境和逆境，体验的快乐和欣慰、辛苦和懊悔、检讨和反思……这一切都和生命镶嵌在一起，不可分割……半个世纪以来，源于北大的胸襟和眼界让我们受益匪浅，北大留在我们身上的印记也

让我们磕磕碰碰……扪心自问，我们对于北大的“感情”是理不清说不尽的，就像是对待自己的父亲和母亲。

或许应该这样说：今生今世能够生活在未名湖边，生活在北大，生活在与清华一墙之隔的蓝旗营小区，是上天赐给我们最大的幸福。

这里记载的文字只是难以忘怀的片片段段，当然远不是五十年的全部。

.....

而今，这本书的名字定为《两忆集》，则包含着两层意思：一是指两个人的回忆，另一是回忆的事情是两个方面的，不过事实上，“东京记忆”也还是属于“北大记忆”中的一部分。

这本书仍然是两个人分别撰写、互相修改和订正——毕竟说的这些都已记忆中的旧事了。仍然循照《两忆集》的旧例，不再一一署名，减去麻烦啰唆。

今年，北京大学出版社建议重版《两忆集》，大概是为了纪念北大120年校庆。出版社提出，希望删除“东京记忆”部分，加强“北大记忆”部分。他们的建议很有道理。因此，我们删去有关东京生活的篇目，搜罗加入了近几年所写的与北大生活相关的，包括记述具有“北大身份”的学者和朋友的文字。因为内容的改动，便取集中某一文章的题目，将《两忆集》易名为《家住未名湖》。

著者 于北京海淀蓝旗营

2017年9月

目 录

序 01

批判者和被批判者

——北大往事之一 001

我的最好的“演出”

——北大往事之二 009

哲学楼 101 011

外来者的“故事” 015

“严”上还要加“严”

——严家炎先生印象 022

“知情人”说谢冕 030

我和“北大诗人”们 039

祝贺曹文轩的四条理由 045

他们都“曾经北大” 050

“艰难的起飞” 055

教学与科研纪事 060

《南方都市报》访谈 067

《1956：百花时代》前言和后记 077

- 《问题与方法》初版自序 085
- 在“学术作品集讨论会”上的发言 091
- 北大退休之后 096
- 到北大念书 102
- 我的老师
——记吕乃岩、林庚、马振方 112
- 在北大经历“文革” 121
- 入团纪事 134
- 日记的故事 143
- “大象”
——记副系主任向景洁 149
- 结婚证的麻烦 154
- 家住未名湖 157
- 和吕薇芬在一起的日子
——忆念《古本戏曲丛刊第五集》的编辑和考订 174
- 博学多闻的王学泰 193
- 我所认识的吴晓铃先生 214
- 吴晓铃先生的伴侣石素真 228
- 求扇面的故事 235
- 日本的中国古代戏曲专家传田章 274
- 东京大学文学部的平山久雄先生 283

批判者和被批判者

——北大往事之一

1965年秋天到1966年上半年，我和学生一起，在北京近郊农村的朝阳区小红门参加“四清”运动（“社会主义教育”运动）。那时，我毕业留校任教已有四个多年头。6月1日，中央电台广播了聂元梓等的大字报后，学校很快派进“工作队”，并要我们立即返回，参加被称作“文化大革命”的运动。踏入校门，看到到处贴满大字报，到处是骚动激昂的人群：这很像我想象中的或从文学作品中看来的“法国大革命”（或俄国“十月革命”）的样子。按当时的规定，我不再到学生的班里去，而返回教研室，教师集中学习、开会。

6月上旬的一天，我任班主任的那个班的一个学生干部来到我的宿舍。敲开门后，站着且神情严肃地通知，下午去参加他们的班会。我问会议的内容，他不肯坐下，也没有回答径自离开。下午2点我来到32楼，楼道里贴满了大字报。也有关于我的，还配有漫画，好像是契诃夫小说中的人物凡卡在跟我说着什么——《凡卡》是我给他们上写作课时分析过的文章。我来不及细看，推开他们通常开班会的房门，发现全班三十几位同学都已挤在里面。所有的人都沉默着，屋里出奇

的安静；都看着我，却没有人和我打招呼。我看到床的上下层和过道都坐满了人，只有靠窗边空着个凳子：意识到这是我的座位。便低着脑袋，匆匆走到窗边坐下。

这时，主持人宣布：“今天我们开班会，对洪子诚同志进行批判。”这突如其来的“批判”，和突如其来的“同志”的称呼，顿时使我没有一点思想准备的脑子陷于慌乱之中。接着便听到“洪子诚你要仔细听大家的发言，老老实实检查自己……”的话。于是，我几乎是下意识地掏出笔记本，转身面向桌子作着记录。从批判发言中，我逐渐明白了我的问题是什么。一是在教学中，散布资产阶级毒素，特别是小资阶级情调；另一是当班主任犯了“阶级路线错误”，重用出身反动阶级家庭的学生。不错，团支部和班会干部大部分出身革命干部和贫下中农家庭，但“洪子诚没有真正依靠我们，思想深处是喜欢那些少爷、小姐的”。发言有的尖锐激烈，有的语调措辞却有些迟疑；可能是前些天还称我老师，现在当着我的面，不知怎样才能做到理直气壮直呼我的名字。桌子是靠墙放的，这使我记录时可以不面对学生，情绪也因此稍稍安定。

大约过了一个多钟头，已经有些平淡的会议，突然出现一个小“高潮”。一位坐在上铺的学生揭露我在课堂上“放毒”，说到激动处，放声大哭起来。“你不让我们写游行见到毛主席，是什么居心？！我们革命干部、贫下中农子女最热爱伟大领袖，我们最最盼望、最最幸福的时刻，就是见到他老人家，你却不让我们写……”他哽咽着，无法再说下去。这真诚、发自肺腑的控诉，引起在场许多人的共鸣；有人便领着呼叫“毛主席万岁”的口号。我愣住了，但他说的确有其事。在写作课上（毕业后我一直给中文系和文科各系上“写作课”），通常对一年级刚进校的学生，会出“初到北大”之类的作文题，许多人便自然会写他们参加国庆游行的情景。在文章讲评时我好像说到，如果我们要战胜平庸，就要注意和培养你的敏感，发现你的真实体验；拿游行

这件事来说，每个人的发现是不相同的，因此，不要千篇一律地从准备、出发，写到见到毛主席，到最后回到学校；可以写出发之前，也可以写归来之后；你所认为最重要的，并不一定是最值得写的……这个同学说的，应该是指这件事了。在这个“高潮”出现之后，批判会倒不知如何再进行下去。于是，主持人宣布结束。屋子里又回复到开始前那种异样的安静。我收起本子，在众人沉默的注视下，匆匆离开。

回到宿舍，从本子上一条一条地看着我的“错误”，越看越觉得伤心、委屈，甚且产生怨恨的情绪。回想着我如何认真准备每一次课，如何批改每一篇文章，在上面密密地写着批语，如何对学生个别指出存在的问题……我忘记了当时的社会情势和社会心态，钻牛角尖地想不通：真诚的劳动为何得不到承认，反而受到指责。很长一段时间，便陷于“自艾自怜”的沮丧之中，并为这种情绪寻找合理的解释。但这件事很快就被“我们”忘记。说“我们”，是因为不管学生还是我，都被引导并投入到对更大的事件和更大的人物的关注。大大小小的批判会，在那几年，也已成为家常便饭。我和学生的关系，从表面上看，很快也恢复到原先的状况。而且，好像是一种默契，关于那次批判会，我们后来谁也没有再说过一个字。但是，对我来说，存在于心理上的隔阂、障碍，却没有完全消除。

重新想起这件事，是到了1969年10月底的时候。那时，我和大多数教员，已被宣布到江西鄱阳湖畔的“五七干校”劳动。临走前，有许多事要处理：书籍装箱存放；购置劳动生活的用品；觉得很可能不会再返北京，便和谢冕、周先慎骑着自行车，跑遍北京有名的古迹胜景摄影留念……最让我伤脑筋的是，大学入学以来的十多本日记如何处理。不论是带走，还是放在系里寄存下放教师物品的仓库，都觉得不妥当。倒不是里面有什么“里通外国”之类的秘密，而是写给自己的文字，不愿意让别人读到。想来想去，终于在走之前的一天，在19楼（中文、历史系的单身教员的住处）前面树丛间的空地上，一页页撕开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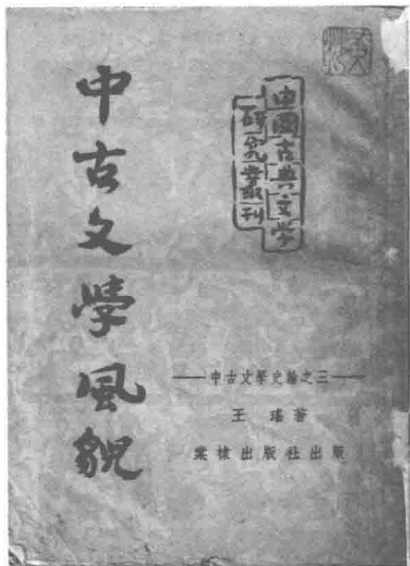
1969年秋出发到江西“五七干校”之前，洪子诚和谢冕（左一）、周先慎（中）骑自行车，在北京的古迹胜景摄影留念。

烧掉。烧时不免留恋地翻读，然后看着它们成为黑灰。在读到58、59年间的那些部分时，我发现，原来那时我也充当过激烈的“批判者”的角色。

1958年，我已是二年级学生。“反右”运动结束不久，便是全国的“大跃进”。除了参加修建十三陵水库，参加除“四害”“大炼钢铁”，参加为创小麦亩产十万斤纪录深翻土地的运动外，在学校便是“拔白旗、插红旗”——批判“资产阶级”专家权威。北大是著名学者荟萃的地方。我们进校之前，对文史哲“权威”的名字就耳熟能详。他们大多在这个运动中受到“冲击”。记得，中文系的语言学家王力、岑麒祥、袁家骅、高名凯，作家和文学史家吴组缃、林庚、游国恩、王瑶，他们的学术思想和研究成果，在这期间都受到批判。而我所在的班，批判的是王瑶先生。

直到现在，我仍不清楚这个“任务”为什么交由我们班来承担。我清楚的是，无论作为一个运动，还是具体批判对象和批判方式，都不只是学校的事，更不可能是我们这些很少政治经验和阅历的青年学生所能决定。对王先生的著作，主要批判的是他的《中国新文学史稿》——这是1949年以后最早出版也是当时最有影响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著作。当时，我们实际上还未学习现代文学史课程（那是三年级的必修课），书中述及的许多文学现象和作品，对我们来说都很陌生。但是，既然认定《史稿》是资产阶级性质，我们这些站在“无产阶级立场”上的“小人物”，就有资格藐视权威。于是分成几个小组，分别就文艺界“两条路线斗争”“党的领导”“研究方法”等若干专题，进行准备。我被分在最后的小组。我们先学习毛泽东的《新民主主义论》和《讲话》，学习周扬总结“反右”运动的文章，然后根据我们所掌握的这些“武器”，来寻找《史稿》中的资产阶级立场、观点和方法。当时，暑假已经开始，我在参加了几次讨论后，便回南方的家乡。待到开学

这本《中古文学风貌》是1953年5月上海棠棣出版社出版。该书1951年8月初版，至1953年5月出了6版，印行15000册。



归来时，同学们已写出几篇批判长文，并已交到杂志社。不久，这些锋芒毕露的长篇文章，便在下半年的文艺界权威刊物《文艺报》和《文学研究》上刊出。其中最主要的一篇，题目是《文艺界两条道路的斗争不容否定——批判王瑶的〈中国新文学史稿〉》，作者署名为“北京大学中文系二年级鲁迅文学社集体写作”。是的，当时我们班组织的文学社，便以“鲁迅”命名。我在日记中写道，看到这些成果的发表，听着在校坚持战斗的同学对写作的情景的讲述，我感到很惭愧。在批判开始的时候，我的好朋友给我写了这样一行字：“你闻到硝烟的气味了吗？做好了投入战斗的准备了吗？”但我却临阵脱逃，这使我后悔，觉得这个缺憾，将难以弥补。

在批判文章发表后不久，王瑶先生的名字，便从《文艺报》编委的名单中消失了。我无法知道王先生受到批判时的内心活动，但我知道，他本来也是想顺应潮流的。在“反右”刚开始时，他就发表《一切的一切》，表示对于“右派分子”的谴责。这篇文笔、结构相当漂亮的短文，登在《文艺报》的头版头条。1958年初，他的评冯雪峰《论民



王瑶先生的《一切的一切》刊于《文艺报》1957年第12期（6月23日出版）。上面的画线和批语出自当年北大中文系某一学生之手。

主革命的文艺运动》一书的长文，也刊在《文艺报》上。他批判冯雪峰的依据和逻辑，也就是半年后我们批判他的依据和逻辑。但王先生没有能使自己免于“厄运”。

临近毕业，不管是学校领导，还是我们自己，都觉得这几年中损失很多。许多该上的课没有上，该读的书没有读。当然，也许更重要的是失去一些基本品格，例如，长幼尊卑的界限、对待事情（学问也在内）的老实态度。在上五年级的时候，便集中补上一些必修课。如古代和现代文学史。现代文学史采取讲座的形式，把重要文学现象和作家作品，归纳为若干专题，由几位先生轮流讲授。王瑶先生讲头四讲，记得有五四文学革命、鲁迅、曹禺等。他浓重的山西口音，我听起来很吃力，因此，每次总要先占好前排的座位。对于两年前的批判，我们（至少我自己）并没有正式向他道歉，承认我们的幼稚和鲁莽。但我当时想，诚挚地接受他的授业，应该是在表示我们的反省。我看到，他在不久前指责他的学生面前，没有丝毫的揶揄讥讽的语气神态。他认真细致地陈述他的观点，讲到得意之处，便会情不自禁发出我们熟悉的笑声。他对曹禺等作家的分析，使我明白世上人事、情感的复杂性。课后，又耐心地回答我们提出的问题。这种不存芥蒂的心胸，当时确实出乎我的意料。他是在表明，我们每个人都无法脱离社会历史的拘囿和制约，却可以在可能的条件下，选择应该走的路。

在把“文革”发生的事情，和以前的经历放在一起之后，我开始意识到，我们所遭遇的不正常事态，它的种子早已播下，而且是我们亲手所播。在我们用尖锐、刻薄的言辞，没有理由地去攻击认真的思想成果时，实际上，“批判者”也就把自己放置在“被批判”的位置上。这一对比又使我想到，对于生活中发生的挫折，我没有老师的从容、沉着，我慌乱而不知所措。这不仅因为我还年轻，缺少生活经验，最主要的是心中几乎没有什么东西可以作为有力的支柱。更让我难堪的是，批判会上，我被学生所“质询”、所批判的，竟是些什么“不让见

毛主席”“阶级路线”之类的可笑的东西，是我那几年发表在报刊上追赶政治风潮的“时文”。而我们 50 年代想要“拆除”的，则是王先生的具有学科奠基性质的《史稿》，是他的也许更具价值的《中古文学史论》：这是让批判者最终要回过头来请教的著作。在王瑶先生的心中，有他理解的鲁迅，有他理解的魏晋文人，有他的老师朱自清。因而，在经历过许多的挫折之后，我们看到的是一种成熟和尊严，这是他在 80 年代留给我们的印象。而我们呢？究竟有些什么？心灵中有哪些东西是稳固的、难以动摇的呢？

对于已走过一百年路程的北大，我们个人可能难以讲清楚其间的辉煌与衰败，光荣与耻辱，我们可以说的，是个人亲身感受到的“传统”。在我看来，北大最值得珍惜的“传统”，是在一代一代师生中保存的那样一种素质：用以调节、过滤来自外部和自身的不健康因素，在各种纷扰变幻的时势中，确立健全的性格和正直的学术道路的毅力。这种素质的建立和传递，可以肯定地说，不仅来自于成功和光荣，也来自于我们每个人都经历到的挫折，就如王先生的人生和学术道路给我们所留下的深刻印记那样。

（附记：应校方宣传部门之约，本文写于 1998 年北大 100 周年校庆前夕。但被退回而未采用。）

我的最好的“演出”

——北大往事之二

去年岁末，因为给 95 级同学上课，便也参加了他们的新年联欢会。在课堂上认认真真、正襟危坐的同学，一个个居然都那么多才多艺！按照惯例，老师出节目是不可少的。果然，我发现温儒敏先生原来是个诗人（他朗诵了他写的诗），程郁缀先生记性真好（他背诵了《春江花月夜》，我却永远也记不住），而王宇根诸先生也都有不亚于目前电视节目的上好出演。轮到我的时候，却一筹莫展，最后只有以鞠躬向同学们“讨饶”。

我的不表演节目是因为我不想“重演”从前发生过的“喜剧”。说是“从前”，那应该是三十多年前的事了。1963 年冬天，我留下来当教员刚满两个年头。那时，和马振方先生带着 63 级同学到昌平园区（当时并没有这个称呼，而叫 200 号）去劳动：在荒凉的山坡路旁植树（不知道现在那些高大的杨树是不是我们栽的）。天寒地冻，又是砾石土质，活并不轻松。但也有许多的快乐。好像也是赶到过新年，也是开联欢会，也是要老师出节目。马振方先生表演东北大鼓《罗成叫关》，字正腔圆和地道的韵味，引来啧啧赞叹。轮到我出场了，我便郑

重其事去到圈子中央。静默片刻之后，便“引吭高歌”起来，唱的是当时正流行的、由军队歌唱家马玉涛唱的那首歌：“马儿呀，你慢些走哎慢些走……”万万没有想到的是，一句未完，四周已经乱成一团：同学们全然不顾老师的“尊严”，一个个笑得前仰后合——我当时才真正领会了“前仰后合”这个成语是什么意思。我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，但意识到肯定出了问题，便匆忙逃回自己的座位。这阵笑声，真是“久久不能停息”，当我抬起头来时，还见到旁边直起腰的同学眼角笑出的眼泪。这使我颇为扫兴：要知道，为了准备这个节目，我偷偷地在19楼的宿舍里练习了有半个月。

多年以后，一位已参加工作的学生见到我，还不忘这件事：“洪老师，您也不想您能唱什么，选个《东方红》《我是一个兵》也就罢了，却选这样的‘高难动作’，又是满口的广东腔，马儿的‘儿’舌头拐不了弯，‘慢’唱成了 mang……还一本正经的样子。”

以后，在生活中，也经常发生这种预想与结果不同，甚至相悖的事情，但发生在青少年时代的事情总是印象更为深刻，当然，也更值得珍惜：连同这种“不能正确估量自己能做什么”的“狂想”。

现在想起来，我的演出，一定是那个晚上最精彩的节目了。

1996年